

东亚汉字文化圈 古代文学论集

李时人 翁敏华 严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汉字文化圈 文学论集

李时人 翁敏华 严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汉字文化圈古代文学论集/李时人,翁敏华,严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0773-5

I. ①东… II. ①李…②翁…③严 III. ①汉语—古代文论—东亚—文集
IV. ①I31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7256 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8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5 插页 2

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73-5

定 价 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弁言	李时人 1
----------	-------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李时人 杨 彬 3
-----------------------	-----------

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李时人 聂付生 25
-------------------------------	------------

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	
------------------------	--

创作流传	李时人 42
------------	--------

新罗崔致远著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李时人 77
-----------------------	--------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李时人 103
--------------------------	---------

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成书与渊源	李时人 120
--------------------------	---------

越南古代汉文诗叙论	李时人 刘廷乾 139
-----------------	-------------

伎乐·上云乐·舞回回

——中、日、韩戏剧史上的一段因缘	翁敏华 177
------------------------	---------

由能乐看中日古文艺的授受与背离	翁敏华 190
-----------------------	---------

从韩国“唱剧”看中韩古代演艺文化的交流	翁敏华 207
---------------------------	---------

中日两国的梦意识与梦幻剧

——以《牡丹亭》、《井筒》为视点	翁敏华 228
------------------------	---------

《长生殿》系列与系列外的《杨贵妃》	翁敏华 240
-------------------------	---------

蛇变人还是人变蛇

——中日传统演剧舞台上的蛇女故事剧	翁敏华 250
-------------------------	---------

《春香传》与《桃花扇》

——韩、中妓女才女剧比较一题	翁敏华 265
----------------------	---------

东亚瑞兽信仰、狮子演艺及其源流演变	翁敏华	282
中韩:戏里戏外的地域保护神	翁敏华	307
东亚汉诗视野中的日本狂诗	严 明	336
东瀛汉诗中的春季咏叹	严 明	390
近世朝鲜汉诗论	严 明	405
越南汉诗论	严 明	454
东亚汉诗研究前景展望	严 明	514

弁 言

李时人

地球的东方,历史地存在一个“东亚汉字文化圈”。兼顾地理、历史和文化,这一“文化圈”主要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其地域范围与一些现代西方学者的说法基本相合。如[美]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等提出,“东亚”包括地理、人种和文化三层含义,地理上指受崇岭和大漠阻隔的东部亚洲地区;人种上,指蒙古人种(爱斯基摩人与美洲印第安人除外)的栖居区;文化上则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文明圈”,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并认为“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圈’”(《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1 页)。

毫无疑问,这一“文化圈”有许多明显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圈”的特征,所以有人称之为“中华文化圈”,有人称之为“儒教文化圈”,有人称之为“华化佛教文化圈”,等等。我们之所以取“汉字文化圈”的概念,则因为除了其它特点之外,古代东亚文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以“汉字”作为相关民族、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关联的主要媒介,而文字,特别是较之其他文字带有更丰富“文化信息”的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某种“文化”,甚至是某种“文明”最重要的标识。

“东亚汉字文化圈”是对一种既定历史存在言简意赅的准确概括。大约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这一概念在许多外国和中国学者

的论述中被不断提到,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因此,我们今天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去争论过去这一“文化圈”是否存在,而深入探讨这一“文化圈”的“生成机制”、“文化共相”和在当时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区位特征”,特别是这一“文化圈”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融过程、交融方式、交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这种“文化交融”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所起作用等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探讨,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或许,这样一种研究,对当今世界的“多极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来说,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在“大文化”体系中,“文学”向以及时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情绪心理为职能,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是精神文化中最易感知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古代文学的研究理应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本书的几位主要作者李时人、翁敏华、严明,同为上海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师,长期以来在教学及学术研究中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这一研究的关心。现将我们前几年发表的有关论文集起来,这些文章涉及面较广,亦各有侧重,希望能为关心这一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参考。文章前年已经结集,一直未能交付出版,各位作者近两年发表的论文则不再收入。

2013年10月10日于上海寓所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李时人 杨 彬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影响是在汉字和汉文化,包括大量汉文典籍输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日本和日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情况,提出日本古代小说的“早熟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助了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积累和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入;不同历史阶段陆续传入的中国古代小说,促进了日本古代小说文体的创造更新和艺术上的进步,使日本古代小说的阶段性发展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本文认为,“翻案小说”和“汉文小说”也应该是日本古代小说中不应被忽视的组成部分;日本古代小说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仍然能够坚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则是值得称道的。

日本收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小说的古钞本和古刊本,近世以来,不少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的古代小说,如《游仙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至治刊平话五种”以及明刊“三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都在日本发现,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中国古代小说大量流传日本,必然会对日本古代文学,特别是日本

的古代小说产生影响。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无论对日本古代小说研究来说，还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来说，显然都是必要的——或许对我们深入了解古代东方的“汉字文化圈”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影响是在汉字和汉文化，包括大量汉文典籍输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汉字和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典章制度、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日本“天皇”之有年号，始于“大化”(645)，“大化革新”对日本古代国家体制和律令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次革新运动，就是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662—672年在位)在留学中国归来的高向玄理、僧旻等人协助下完成的。随后的日本更热衷于吸收中国文化，许多遣唐使团成员，如山上忆良(660—733)、吉备真备(695—775)、空海(774—835)等，归国后都成了影响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人物。

汉字、汉籍的输入，对日本的宗教、史学、文学等的影响都是直接的。以史学而言：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女皇二十八年(620)时圣德太子就已仿中国的史书，主持编纂过《天皇记》、《国记》等史书。至和铜五年(712)，日本又用汉字和汉字作音标，编成了《古事记》一书，成为现存最早的史书。稍后又完成了全部用汉字写成的国史《日本书纪》(720)，体例仿中国的正史本纪，纪年亦仿中国，首开日本“六国史”之先河。《日本书纪》不少地方袭借中国的历史，甚至有不少直接袭用中国史书文字的地方——如开天辟地说，就是据《淮南子》和《三五历记》的文字整合而成，卷十四所谓雄略(日本传说中的第21代天皇)的遗诏，显然借用了隋文帝

仁寿三年(603)的诏书^①。中国史学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史学最初的情况,也由此可见一斑。

汉字和汉籍的传入,同样直接影响了日本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一般认为,日本文学发端于神话传说、古歌谣等,但日本的神话传说、古歌谣等口传文学,集中记述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和《古语拾遗》(807)等早期典籍中。从口传性上说,日本文学的发端具有日本文化,包括日本语言思维的一面;但从记述性上说,它又有汉字思维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于日本第一部和歌集、成书于8世纪后期的《万叶集》中,更有不少模仿和借鉴中国文学的作品。如著名歌人大伴家持的《赠坂上大娘歌》15首中有4首,特别是第1首和第15首可以明显看出受唐人小说《游仙窟》中的诗词韵语的影响。8世纪后期至9世纪,在学习汉语的基础上,日本逐渐形成了以“假名”和汉字并用的表记方式,从而结束了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但即使是“日语文学”发达以后,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仍然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情况贯穿了整个日本古代文学史。

在这其中,汉诗创作甚至成为日本古代文学的传统之一。日本现存的最早一首汉诗据说是天智天皇(662—671)时大友皇子21岁时所作的《侍宴》诗,基本可以看作是对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诗》的模拟^②。奈良时期(710—794)正值中国盛唐诗风大畅之时,日本的汉诗创作也蔚然成为风气。举凡贵族饮宴、迎送,以及文人唱和、抒情言志,无不以赋汉诗为尚。孝廉天皇天宝二年(751)编成的日本第一本汉诗集《怀风藻》,按年代收近江、奈良两朝80年间64位作家的汉诗120首,一般为五言,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摹拟中国诗歌的痕迹。至平

① 参见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4月版,4—6页。

② 大友皇子《侍宴》诗:“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诗》:“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万年书。”

安时期(795—1192),能熟练运用古体、近体、乐府等形式的汉诗作者大量增加,现存平安前期所编的汉诗集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三种,平安中期所编的汉语诗文集有《本朝文粹》和《本朝续文粹》。虽然平安后期有“和歌”的复兴,至镰仓时期(1192—1333)、南北朝时期(1334—1392)和室町时期(1393—1602),由于幕府尚武偃文,汉诗文显得冷落,但由于禅学盛行,仍有“五山诗僧”从事汉诗创作,300年内名家辈出。江户时期(1603—1868)步“五山文学”后尘,出现了古学派、古文辞派、性灵派等汉诗作家,并再次形成汉诗创作的高潮。崇尚汉诗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近世。明治时期(1868—1912)以鼓吹汉诗文为宗旨的文会、诗社很多,汉诗创作仍然十分兴盛。

相对诗歌而言,小说是人类“成年”的艺术,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中国7世纪初出现并在8世纪达到相当繁荣的唐代言言小说,是世界范围内最早成熟的短篇小说。在此之前,则除了史传的叙事积累外,还有大量杂史、杂传、志怪书和叙事文学作品的长期累积。唐代是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高潮时期,所以唐人小说及汉魏以来的大量叙事作品也同时传到了日本。如武后时张文成(名鸞)以能文著名,《旧唐书》记云:“鸞下笔敏速,著述尤多……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人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卷一四九)。《万叶集》所收山上忆良于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所作的《沉疴自哀文》中已提到:“《游仙窟》曰,九泉下人,一钱不值。”山上忆良曾于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武则天大足元年,701),以“少录”身份随遣唐使粟田真人来华,在中国停留两年,所以有日本学者认为《游仙窟》很可能就是由他带回日本的^①。此说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并非不可能。如是,则《游仙窟》在张文成生前已经传到了日本。因为张文

^① [日]山田孝雄《醍醐寺本〈游仙窟〉解题》,大正十五年(1926)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本卷首。1929年谢六逸曾译出,题为《游仙窟解题》,刊于《文学周报》8卷2号。

成大约生于高宗显庆三年(658),卒于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与此情况相类的还有唐临所作的《冥报记》。中国仅《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存有佚文,日本则有数种古代的钞本(前田家藏钞本、高山寺钞本),说明其很早就传入日本。成书于日本宽平年间(889—897)的《本朝见在书目录》(后改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有关“小说”的书目,就记载了《穆天子传》、《搜神记》、《搜神后记》、《汉武故事》等汉晋杂史、杂传、志怪书等多达40余种。平安后期一度任摄政的藤原赖长(1120—1156)的日记《台记》中,也出现过有关《燕丹子》、《续齐谐记》、《汉武故事》等中国小说的记载。

公元894年,日本在菅原道真建议下停止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但是民间往来,包括商业往来在此后仍然很频繁。宋船到日本见于记载的就有70多次。商船携渡也成了中国书籍流入日本的主要途径,不少贵族文士往往通过商船购买他们需要的中国书籍^①。特别是德川幕府执政的江户时期(1600—1868),由于日本“町人(市人)文化”勃兴,当时中国层出不穷的“明清小说”得以通过商船货贩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光裕天皇宽政四年(1792),大阪书林为“初读舶来小说者”编纂了中国俗语辞书《小说字汇》,征引流传于日本的以白话小说为最大宗的中国各类文学作品达195种之多。这本辞书特地标明为阅读“舶来小说”而作,可见这些小说主要是通过商业往来到达日本的。

当时记录中国商船载入汉籍的诸多文献,如“赍来书目”(记录中国船只载来之书籍)、“书籍元帐”(对进口书籍检阅的记录)、“直组帐”(日本商人和中国船老大围绕书价进行协定的记录)、

^① 据日本《宇槐记》记载,平安后期的日本政权的实际操纵者和当时日本的著名学者藤原道长,曾于仁平元年(1151)将他所需要的中国书籍制成《要书目录》,并以沙金30两为礼,请中国商人刘文冲代购。参见[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王宝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0页。

“见帐”(拍卖货物前进行清点并记录货物特征并估价的记录)、“落札帐”(最后成交价的记录),以及江户时期日人所编的《商船载来书目》、《舶来书目》等^①,都记录了当时中国小说传入的情况。如经营进口中国图书的书商唐本屋田中清兵卫制作的《唐本目录》和《舶载书目》载:享保十二年(1727年)进口中国小说14部、宽保元年(1741年)进口中国小说12部、宝历四年(1754年)九号船载来中国小说30部。日本学者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资料编中所收的“商船载来书目”也有《三国演义》、《醒世恒言》于享保十二年(1727年),《今古奇观》于享保十六年(1731年),《警世恒言》于宽保三年(1743年)从长崎进口的记录。《水浒传》更是于正德三年(1713)、享保二年(1717年)、享保十年(1725)陆续进口了多种版本。对日本小说产生巨大影响的《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仅宽政六年(1794年)就一次购进30套^②。宽政五年(1793)从中国南京来的货船也一次带来《红楼梦》“九部”^③,可见当时中国小说输入之盛。

二

中国古代小说流传日本并广泛传播,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日本古代小说的“早熟发生”,而且又因不断更新的中国小说新的、更大规模的输入,推动了日本古代小说文体的更新

① [日]大庭修《书籍之路的方法》,王勇主编《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一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王宝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日]伊藤漱平《日本〈红楼梦〉的流行——从幕府末年到现代的书志素描》,古田敬一编《中国文学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汲古书院1985年版。

和小说艺术的进步。

日本文字的创造本身就是在汉字和包括史传、志怪书、文言小说在内的大量汉文书籍输入以后,所以其最初的叙事艺术的积累,包括史传叙事的积累、散文叙事的积累都不可避免地承继或借助了中国的积累,这应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中、日学者的考察,日本最早的小说,当首推产生于8世纪的汉文小说《浦岛子传》^①。小说叙述雄略天皇时,渔夫浦岛子被龟仙女引到蓬莱仙境,“共入玉房”,后来思乡返家的故事。这篇小说的故事素材或有日本传说的影子,但其“遇仙”的观念、模式则主要源于中国,至于其叙事方式和带有骈丽色彩的文学语言则明显沿袭了《游仙窟》,其最初的文本甚至可以说是以唐代短篇文言小说为蓝本的^②。至9世纪初嵯峨天皇弘仁(810—823)末年景戒用带有日语语法特点的汉语写成的日本第一部佛教小说、故事集《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简称《日本灵异记》),更博采中国的历史材料、佛典、六朝志怪、唐代文言小说等为素材,尤以果报题材的故事、小说为蓝本。故其上卷序言中专门提到“昔汉地造《冥报记》,大唐国作《般若验记》”^③,明说其所受之影响。

① 《浦岛子传》最早见于镰仓初期钞本《古事谈》(《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十八卷,黑板胜美等编辑,弘文馆日本昭和四十年版),后日本《群書類从》第九辑“文笔部”卷一三五及《释日本志》卷一二中辑自《丹风后土传》的两个本子情节文字已略有增饰。日本学者多有认为《浦岛子传》早于《万叶集》(约8世纪后期),参见严绍璎、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文学卷》第三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中国古代的“遇仙”故事,如《续齐谐记》“刘晨阮肇”等,并非上古神话传说,而是在中国“神仙之说”兴起以后的产物。张文成小说《游仙窟》更是假借遇仙之说写其“冶游”生活。《浦岛子传》的故事不仅承袭了中国古代叙事作品的“遇仙”模式,而且语言多有学习《游仙窟》的痕迹。如写仙女之美:“玉颜之艳,南威障袂而失魂;素质之闲,西施掩面而无色。眉如初月出于峨眉山,靨似落星流于天汉水。”袭用的就是《游仙窟》写“十娘”的手法和词藻:“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烧妆;使南国伤心,千回扑镜。”“厖疑织女留星去,黄似恒娥送月来。”等等。

③ 《日本灵异记》,[日]远藤嘉基、春日男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0,岩波书店1978年版,54页。

日本在没有多少叙事艺术积累的情况下就“早熟”地产生了小说,中国古代叙事作品,包括唐代言言小说的大量传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或者说日本古代小说的“早熟”,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或借助了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积累。汉文小说《浦岛子传》既是日本古代小说的发轫之作,也可以说是日文“物语小说”的先导^①。有一些中、日学者甚至认为被称为“物语元祖”的《竹取物语》原先可能也是“用汉文或汉文体写作的”^②,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中国文化和叙事艺术。所以研究者提出,日本的小说史,从口头神话传说到“物语小说”之间,“还横亘着一个以古汉文小说的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过渡阶段……在小说的题材、构思与创作手法诸方面,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从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中吸取了诸多的营养……此种文学交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物语’体小说中,也留下了许多的痕迹,成为‘物语’体小说发展的条件之一。”^③日本学者川口久雄也谈到:“连《源氏物语》、《枕草子》的文体也是受到这种汉文系统形式和内容的影响而形成的。”^④没有中国大量的叙事作品,包括古代小说的传入,没有汉文叙事作品和《浦岛子传》等早期汉文小说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日本“物语小说”的产生,这应该是一个不

① “物语”一词是日语汉字的转写,原有“讲述”、“故事”等多种意思,日本学界将“物语”视为一种文体,又分为传奇物语、写实物语及歌物语、历史物语、说话物语、军记物语、拟古物语等许多种类。广义的“物语”被视为是“日本小说”的同义语,狭义的“物语”则主要指平安朝至室町朝的作品。实际上日本被称为“物语”的作品,不一定是散文体小说,按日本通行的历史划分,进入“近世”以后大量标名为“物语”的作品,也已经不是“古代”和“中世”的“物语”了。本文的“物语小说”主要指的是日本“近世”以前的古代散文体小说。

② 严绍璁、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文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79页。

③ 严绍璁《中日古代文学史关系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版,133—134页。

④ 《菅家文草·菅家后集》解说,[日]川口久雄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2,岩波书店。

争的事实。

日本于10世纪初出现了被称为“虚构物语”的《竹取物语》和被称为“和歌物语”的《伊势物语》后,10世纪末又出现了篇幅很大、以反映平安朝宫廷生活为主的《宇津保物语》和带有劝惩意味的《落洼物语》。11世纪初出现了代表日本中古时期文学最高成就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以后,“历史物语”应运而生。日本奈良朝以来的史书多用汉字,而这类“历史物语”却多是用假名写的。11世纪前期的《荣华物语》叙述了从宇多朝到堀河朝200年间的历史。11世纪末出现的《大镜》,叙述了从文德朝到后一条天皇万寿二年(1025)175年的历史。12世纪后期出现了《今镜》、《水镜》,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增镜》,与《大镜》合称“四镜”(或被称为“镜物”)。镰仓时期和南北朝时期,日本战乱频仍,于是又出现了不少描述战争,反映武士生活的“战记物语”,如镰仓时期的《保元物语》、《平治物语》、《源平盛衰记》、《平家物语》和南北朝时期的《太平记》等。

“物语小说”无疑是日本古代文学的辉煌创造,尤其是《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名篇,更是彪炳世界文学史册的伟大作品。不过,日本古代的“物语小说”从叙事艺术上说尚有很多不足。比如《源氏物语》本来叙述的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宫廷故事,但情节的发展过于缓慢,结构十分松散,基本上是短篇的迭合,前后不少故事大体类同。“历史物语”多采用对话讲述体,或用编年叙述,或采用纪传形式,大量罗列有关记录、日记、佛典等资料,“小说性”并不特别强。“军记物语”中,无论是基于说唱的《平家物语》,还是书面创作的《太平记》都是用“和汉混和”文体写成的,基本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复述,缺乏中心人物的贯穿和小说创作的蓄意经营。因此,就总的说来,日本“近世”以前的“物语小说”基本上还是“小说”发展史上较低阶段的产物。

只有到了江户时期“草子小说”出现,特别是“读本小说”繁盛^①,日本古代小说才出现了新的创作高潮,在小说艺术上得到了更大的提高。而江户时期的“草子小说”,特别是“读本小说”的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则是由于中国“明清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的大量输入和广泛传播。

三

日本早期的“物语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宫廷和贵族生活,至“军记物语”则以“武士”为主人公。随着“拟古物语”的逐渐衰落,室町时期出现了“御伽草子”,或取材于民间“说话”,或将古代的“物语”通俗化^②。到江户初期庆长年至元和年流行的“假名草子”,以“町人”(市人)为主的平民故事更多地进入小说^③。江户中期以井原西鹤(1642—1693)为代表的、主要描写“町人”生活和世态人情的“浮世草子”的出现^④,标志着贵族文学的进一步衰落,“町人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假名草子固然是表达町人世界的,但作为文学形式来说,它还是粗糙的,内容也有局限性。”^⑤井原西鹤以后的“浮世草子”也

① “草子”即“草纸”。日本的“草子文学”是一个不十分确定的概念。广义的“草子”指用“假名”写成的物语、日记及散文随笔,以区别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狭义的“草子”则指“中世”和“近世”文学中的通俗读物,主要是小说。本文在狭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故称为“草子小说”。

② “御伽草子”主要指的是室町时期由大阪书肆出版的通俗读物,日本学界将其分为“信仰物语”、“恋爱物语”、“稚子物语”(主人公多为僧侣)、“继子物语”以及“武勇谭”、“复仇谭”、“孝顺谭”等,其中并不全是小说。

③ “假名草子”是面向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的通俗读物,因其多使用假名,少用汉字而得名。

④ 井原西鹤是“浮世草子”的代表作家,一生创作了20余部小说。主要作品有《好色一代男》(1682)、《好色二代男》(1684)、《好色五人女》(1686)、《日本永代藏》(1688)等。

⑤ [日]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佩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48页。